

##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介评

韩 国 磐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著、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汇集了武大历史系学者近6年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许多优秀成果。《初探二编》共计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版20余幅。诚如此编《前言》所说，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对文书本身的整理研究，一是运用文书资料研究有关的史事，此编主要是做后一类的工作。如按历史事件分类而言，编中包括了户籍、田制、赋役、军事、驿站、交通、工匠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兹先就本编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就有关户籍的论文来说，朱雷同志的《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既对“点籍样”做了明确的释义，又指明这是在逃户问题日趋严重下从而出现的一种带有临时性的检括户口的措施，以保证封建国家掌握纳税服役的丁中人口。他的另一篇《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从两种不同写本的赋文中，看出武后圣历年间李峤建议后的检括逃户与玄宗开元时宇文融的检括逃户两者之间对逃户的处置有所不同。赋文与史籍互证，探讨了文学作品《燕子赋》前后迥异、改写的变化，源于实际括逃政策的变化。

在田制赋役方面，卢开万同志《对唐代西州均田制若干问题的管见》，进一步论证了西州的欠田、退田和给田文书，应是属于均田制的文件。陈国灿同志的《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后，将阿斯塔那出土的几件文书与大谷文书中的几件进行拼合，并进而从拼合的文书中，论证武后圣历和长安年间，不仅在敦煌，而且在广大的范围内进行过全国性的勘田和全国性的检籍活动。其目的在表面上是维护均田制，与私家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实际上则在于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兵役、力役的来源。他的另一文《吐鲁番旧出武周勘田籍考释》，重新考释了30年代黄文弼先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所得一组八件残文书，认为此组文书是武周时期的勘检籍簿草。勘检田籍簿中标明的旧主，大约都是永淳元年(682)以前的田地主人。按照池田温氏原分“田籍同”、“有籍无田”、“有田无籍合授”、“无籍无主”四种情况，论证了武周圣历时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勘田检籍工作，将田与籍分成这四类进行统计，这也是唐朝实行均田制、长期进行勘检所总结出的一套办法。黄惠贤同志的《唐代前期仗身制的考察》，运用文书深入探讨了唐朝前期仗身制的演变、仗身制的身份、仗身钱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陈仲安同志《试释高昌王国文书中之“剂”字——魏朝税制管窥》一文，根据大量文书资料和传世史籍，提出“剂”字的新鲜解释，认为这是高昌王国临时征收杂税及杂征调的征调单。

关于军事方面，首先要说到唐长孺同志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文章以丰富的资料，论证了西州折冲府的建立、卫士的拣点准则和实施情况、卫士的征镇防戍及其变化等，可说是阐明了西州府兵兴废的全过程，实际上，亦可视为唐朝府兵从建置到破坏的整个过程的缩影。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唐先天二年(713)西州军事文书跋》，根据文书记载，发现唐西州出现了一种包括当地百姓、部曲、奴组成的特有的地

方军组织，这种军队平时务农，战时才征集，分为战队和辎重队，但其任务只是保卫地方，并非远征。并敏锐地指出：征发及于奴和部曲，且占相当比例，表明武周以来军事行动频繁，百姓大量逃亡，在白丁中征发兵募的常规已不能应付当时的军事形势，也难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形势。这是个新发现。孙继民同志的《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对唐代府兵的马匹、器械、资装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出土文书所载，除与传世文献相同者外，文书中所记资装比史志所载要多。他的另一篇《跋垂拱四年(688)队伍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研究了垂拱年间安西道行军时的河西形势与当时行军队形的特点，认为这一文书对唐代队的组织构成和队形提供了新资料，并为研究垂拱年间西域军事形势提供了新线索。陈国灿同志的又一篇论文《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详细考证了瓜沙六镇的建制、渊源、六镇的名称、位置，增为八镇的时间、背景及布局、镇的职能及其与县的关系等。指出瓜、沙二州的六个军镇在唐代已有，非如旧说至归义军时期才设置，六镇后来增至八镇，其重心亦转为防御东方甘州回鹘的威胁，创见颇多。

关于驿站交通方面，孙晓林同志的《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考察了西北边州长行坊是唐朝所置交通机构的一部分，沿袭和发展了高昌的远行马制度而来，故有鲜明的边疆特色，长行坊制度详明、组织严密，对巩固唐朝的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鲁才全同志的《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深入考察了唐代西州的驿马、驿田，均按当时法令行事，特别发现驿墙的建筑，具有一定的规格，可补史文之阙。程喜霖同志的《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详细考证了图经中所载十一道，其中八道为《新唐书·地理志》所未载，足补其阙。又指出伊西路、他地道、银山道是通向陇西及南北疆的三条要道。

关于工匠方面，冻国栋同志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一文，根据唐前期西州工匠名籍和工匠应征服役的情况，探讨了唐前期工匠的征发形式和配役办法。认为唐代工匠制度与高昌乃至北京时期有别，工匠的身份较之前代也有明显提高，但也有别于一般民户，他们名隶匠籍，受官府严格控制，官府依据匠籍征发工匠。工匠被征发时应自带口粮、作具；被征发之工匠或从事本行业劳动，或与其他民丁一道配发州县的诸官厅从事一般性劳役。并指出唐代西州匠人中有不少是昭武九姓胡人，他们和汉匠一样受官府控制，征发上役。西州民间手工业工匠为数甚多，他们是西州手工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又提及杜环《经行记》中所记大食的汉匠，未必皆为怛罗斯战役时被俘的唐军随军工匠，颇有新意。又程喜霖同志的《唐代过所文书中所见的作人与雇主》，就文书中所见作人与雇主关系予以分析，雇主有现任官及其家属、前任官及商人等。作人主要来自逃亡农民(不合法)和著籍的贫苦农民(合法的)，他们备受役使之苦，但作人与雇主也促进了丝路之繁荣。

综观全书，具有许多优点和特点。概略言之，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则编中论文均以出土文书与传世史籍互相比较印证，用文书对史籍进行正误补缺，用史籍验证文书的时、地、性质等诸关系，两者相辅相成，是一种推动研究深入的好的科学方法。

二、则通过解剖一个麻雀以了解全局，通过具体研究而洞悉整个制度以至时代变化的脉搏。如对西州府兵的设置及其兴衰的具体考察，可作为唐代府兵兴废的缩影；对圣历、长安年间敦煌的勘田检籍的深入研究，可以明白当时全国性的勘检活动。

三、则对文书本身的诠释与整理，用力甚深，如对“剂”、“点籍样”等的诠释皆是，尤其是对文书的拼合，非用深厚功力，不能及此。

四、则立足于一点，放眼于多方面。如观察到西北边州的雇佣关系的活跃，可以联系到丝绸之路上的繁荣等等。

五、则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晴雨表，用《燕子赋》来论证括逃政策的变化，文史互证，裨益甚大。

正因为如此，故本书所收每篇论文，均能提出新鲜或创造性意见，得出深刻的结论。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以扎实的专业学识和方法，以优良的学风所取得的科学结晶，是最近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又一硕果，显示了集体研究的优势。而选编这部优秀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又会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的进一步的蓬勃发展。